

小说递进与历史的人

——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张大海^{1,2}

(1.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712; 2.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何顿的小说《来生再见》与他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抵抗者》在叙述上有诸多相同、相似的内容。就区别来说,《来生再见》是适合这个时代的、经过打磨后的更为细化的《抵抗者》;但就小说的原创价值而言,《来生再见》并不是何顿的第一部具有突破性转向风格的作品,他只是略有递进地改写了自己十余年前的作品。

[关键词]何顿;晚生代;抗战史;《抵抗者》;《来生再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4-0017-05

The Progress of Novel and the Man in History

——On He Dun's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ZHANG Dahai^{1,2}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He Dun's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is the progress of his novel *Resisters* which was printed in 2002. They are similar in narrative and conten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new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was more polished and detailed and more suitable for this era, but it has little original value, since the novel is not He Dun's first breakthrough in his writing life. and he just rewrote his novel *Resisters* with few improvements.

Key words: He Dun; the late born generation; the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Resisters*; *See You Next Life*

当小说家以日常经验为主题的创作进入到一定阶段后,大凡都会寻找新的写作方向,其中尤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新的小说创作的作家为多,湖南的小说家何顿也不例外。何顿原名何斌,因为仰慕美国巴顿将军,改名何顿。这一笔名最初用在1985年《芙蓉》杂志第六期,他以“何顿”这一笔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处女作《结婚那一天》。到1990年代,何顿与张旻、毕飞宇、鲁羊、述平、韩

东、朱文、刁斗等人逐渐引起评论家关注。1995年,陈晓明认为“人们已经习惯用‘先锋派’来称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等人,因此,用‘晚生代’来指称这个后起的群体”。^[1]自此,何顿被视为“晚生代”作家。虽然文学史上对何顿等人有这样的命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比先锋作家出生晚的作家,事实上,就出生年龄来看,出生于1958年的何顿,还要比苏童大五岁,比余华大两岁,比格非大六岁,比孙甘露大一岁,而同为“晚生代”作家的毕飞宇、韩东、刁斗、鲁羊、张旻、述平等人和苏童等先锋作家

收稿日期:2016-05-01

作者简介:张大海(1977-),男,黑龙江大庆人,大庆师范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地域文学。

的年龄差距也只是在伯仲之间。这样,在文学史中对所谓“先锋”或者“晚生代”的区分,就不能单纯的是一个有关作家出生序列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对他们何时有效地进入文学场,并受到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关注的问题。先锋作家较早得到关注,和他们较早的进入北京的文化生态圈有关,其写作和受到的评论多有学院派批评家支持。而晚生代作家由于多身处江南各地,所以其生长更为自由,也较早的进入世俗社会,其写作更容易接受或者说是更容易追逐市场化。如果以“庙堂”和“江湖”来比喻“先锋”和“晚生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他们在1990年代写别的差别。

何顿和其他晚生代作家有着类似的教育经历,他们“大多生活在都市,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2]“晚生代”作家在1990年代进入写作状态时,正赶上知识分子们经历了启蒙精神解体后的彷徨期,世俗化的商业写作一度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想。”^[3]所以,在这一时期何顿创作的小说中,多以世俗生活和男女情感纠葛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典型的作品如《我们像葵花》(1995)、《物欲动物》(2003)、《我们像野兽》(2005)、《黑道》(2010)、《时代英雄》(2014)。这些作品让何顿成为一个面向世俗世界的“晚生代”作家,但在他进行了充分的青春荷尔蒙式的写作后,开始逐渐转向了湖南人的历史,尤其是有关湖南人抗战史的小说创作。自2000年后,何顿陆续发表了正面描写抗战史的小说《抵抗者》(2002)、《湖南骡子》(2011)、《来生再见》(2013)、《黄埔四期》(2015)。从内容来看,这四部小说其实可以合并成三部小说。《抵抗者》可以看作是《来生再见》的先导版。因为除有些细节上的差别外,这两部小说在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上都非常接近,甚至相同。而《湖南骡子》和《黄埔四期》虽然同为抗战和民国时期的湖南人历史,但在独立叙述上却又区别于《抵抗者》和《来生再见》。

二

《来生再见》和《抵抗者》在写作内容上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这两部小说甚至从作者的序言开始

就几乎合体了。《抵抗者》的序是《一首迟来的挽歌》,《来生再见》的序是《唱一首迟来的挽歌——为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中阵亡的抗日将士》,更为详细的合体内容当然在具体的阅读中。但这两篇序也有区别。在《来生再见》的序尾,“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这段话在《抵抗者》的序中是没有的,然而,在《抵抗者》正文的第四页下端,却有一字不易的相同语句。对于没有看过《抵抗者》的读者来说,《来生再见》当然是一部全新的作品,但对阅读过《抵抗者》的读者来说,阅读《来生再见》的体验,基本就变成了如同在细节中寻找图片差别的游戏“大家来找茬”。当然,小说写作不同于精细的图片区分,《来生再见》毕竟要比《抵抗者》多出10余万字,这也就为《来生再见》的创作提供了一些空间。不过从全文整体内容来看,这点创作空间与其说是创作,莫不如说是为适合现在的读者而做的改动。比如更改相应的年份,或者将某些略显粗糙的用词做一下修饰,而小说整体的面貌,或者打一个比喻,是房屋的整体结构,甚至是主要的装修风格并没有过多变化。简单的说,就是《抵抗者》是何顿原创出来的,而《来生再见》则是他从《抵抗者》修饰出来的。比如在第二节中,“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爹很少在家待着”及这一段后面的叙述中,《抵抗者》就谈的比较简略,《来生再见》则讲述的比较详细,虽然范畴没有脱离《抵抗者》的表述,但细节足够有了。当然,何顿在《来生再见》中的这种修改,也有并不成功的地方。比如谈到“我和我姐”的出生,《抵抗者》中是这样讲述的,“我和我姐都出生在黄家镇迎春路小学的一间潮湿的平房里,这是我们长到懂事的时候老爹告诉我们的。那个接生婆于我们不懂事时一命呜呼了,据说是患狂犬病死的,自己撕咬自己。她的儿子怕她咬孙儿和孙女,只好把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让她去撕咬自己,结果她把自己身上撕咬得鲜血淋漓。死得很惨。”《来生再见》对此没有陈述,只是一句“我和我姐都出生在黄家镇医院。”《来生再见》里这样写“我和我姐”的出生,显然少了如《抵抗者》中对“我和我姐”出生后的传奇的关注。这样的重写,固然是

何顿希望以出生来远离原生态的历史场域，放弃一种可能粗鄙来源的理由，但在小说创作上却是一次败笔。因为他显然忘记了小说是不同于现实的影像，而只有影像丰富的小说才更有想象的空间。

《来生再见》和《抵抗者》的另一个区别，是在标点符号的安排上。《抵抗者》的人物对话并不常用引号，而《来生再见》则把人物对话具体化，经常用具体的冒号、引号标示出人物对话之间的差别。在对历史材料的引用上，《来生再见》和《抵抗者》多有相同内容，因为这些史料并非作者独创，所以在引用时自然也就如此照搬。比如在第五节“就常德一隅言，被毁民房约万栋，值十四万万元”一段的记叙，这两部小说的摘引内容都是一致的。紧接着这一段讲述的是一二五师少将师长被俘的事，《抵抗者》中没有具体介绍这位师长，甚至没有提及这位师长的姓名，《来生再见》里介绍了这位田师长。从这里也可看出何顿在进行小说修订前，应该是查阅了相关资料，获得了新的历史知识，这也为他在《来生再见》中丰富抵抗者们的抗战史提供了写作基础。

对湖南人参加抗战的历史，《来生再见》比《抵抗者》的记叙更加主动。《抵抗者》中抗战的湖南人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背景下的湖南人，这比如第六节“一九九五年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同样位置的《来生再见》却在谈“二〇〇三年是常德会议六十周年”，这样的两个前提自然在下面的段落中会有不同的叙述重点。一个是有关纪念抗日战争的缅怀，而另一个则是有关湖南常德会战的往事叹息。因为何顿是湖南作家，他写的小说自然离不开湖南的历史和湖南的人，也许在《抵抗者》中他的湖南情结还不够强大，但在《来生再见》里，他却已注意到了这种需要得到认可的湖南情结。这其实也正是《来生再见》是《抵抗者》的递进之所在。当然，《抵抗者》的递进工作又远不止于此。《来生再见》中塑造了一个《抵抗者》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和尚，和尚是和“我爹”黄抗日一起参加抗日战争的人，因为曾经当过和尚，所以文中也是这样称呼他。他在战争中的作用除参加战斗外，就是为死去的战友超度。这大概也是《来生再见》比《抵抗者》看起来更多了一层宗教色彩的

原因。另一方面，即便是从非宗教的角度考虑，“和尚”这个人物的设置也回应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战争想象，这让《来生再见》中反复提及的“来生再见”“来生打鬼子”，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弥补民族创伤的心理安慰。也因为此，《抵抗者》和《来生再见》在小说的命名上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因为《抵抗者》是注重史实的抗战小说，它的风格如同古典小说的定义，这是何顿以近史的态度来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品，如同古代的稗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4]是以虽为不录于正史的人物，而又能写出正史所忽略的细节，以其理所当然的方式再现了可供后世仰望的前辈。《来生再见》固然也有这样的写作前提，但其文中的宗教暗示似乎也隐含着何顿这十来年的思索，他已经从单纯的世俗生活、历史回忆转向具有更具终极关怀、甚或如宗教与神的范畴。

如果单纯地进行小说对比阅读，与相近的文本段落进行对比的细节又会在这两部小说的不同叙述点引起新的历史联想。将来的读者或者研究者如果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抵抗者》和《来生再见》之间的关系也会有自己的判断，本文不再赘述。就这两部小说来说，何顿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告知读者《抵抗者》与《来生再见》之间近乎合体、只是略有递进的先后写作关系，这让初次接触《来生再见》的读者，误以为这是何顿作品中首部有关抗战史的小说，这自然会影响到对何顿创作情况的评价。而揭示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和联系，正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应注意到的。

三

小说是人的历史，同样，历史也是人的前提和结果。由于何顿是继先锋文学之后出现的晚生代作家，那么他的写作自然也有可能带有先锋作家的某些写作特征。以先锋作家余华为例，余华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经常以父子或者类父子的关系来设定。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到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常见的父子关系成就了余华小说的叙事脉络。这

一点在何顿的抗战小说中也有体现。因为抗战是发生在何顿父辈时期的事情,以父辈的亲身经历来写作小说中的故事,也有了一种近似第三人称的第一人称视角,这为小说叙事增添了生动性。何顿的抗战题材小说《抵抗者》《来生再见》《湖南骡子》都在小说中设置了父子关系,主角都是“我爹”,其内容自然也都是“我爹”的传奇。从何顿的多部小说来看,第一人称叙事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小说写作方法。就他稍早的长篇小说来说,无论是《我们像葵花》,还是《我们像野兽》《时代英雄》,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都是“我”,而这个“我”都有现实中的何顿曾经学习、工作过的痕迹。比如《我们像葵花》中的“我”是文革中的一代少年,“我”作为旁观者讲述我的同学冯建军等人的故事。《我们像野兽》中的“我”是长沙市轻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大专生,和1980年代的美术学院毕业生们在一起生活。何顿曾经是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这种生活自然是他熟悉的。而小说中以美术毕业生的青春生活为蓝本,看起来就有些像是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长沙版。《时代英雄》是讲“我”由老师转为商人的故事,但其故事原型却又离不开秀才落难,美人搭救,而后两人腾达的旧小说套路。何顿的抗战小说没有这样处理,毕竟这里有一层相隔阂的时代情境。不过何顿以“我爹”的视角来想象抗战,除了抗战本身的意义外,也有他自己独特的价值。

首先,何顿非常重视史料的挖掘。在讲述历史时,引用足够有说服力的史料,这其实是属于学术研究、学术训练的方法。何顿的这几部抗战小说都有这样的特征,有的甚至就用历史上真实人物的姓名和事件。就《抵抗者》和《来生再见》所披露的材料来看,何顿选取了《湖南省志》《湖南文史资料》《中央日报》等公开出版的材料和张九思、朱懋禄、毛国风、饶少伟等的回忆录。这些史料的出现,充分支撑了何顿抗战史小说在史实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当然,作为小说的当事人“我爹”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仍是起到了贯穿的作用。正是“我爹”黄抗日的交代材料,才让《来生再见》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叙述时间,可以进行忽而抗战、忽而现实的交叉回忆。其次,在写作人物的情欲环节时,何顿的抗战史仍不能完全脱离他在1990年代“晚生代”的写

作风格。这大概也是何顿久处“江湖”之远,而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妥协的结果。不过相较《物欲动物》时代的何顿,抗战史背景下的情欲生活已经在他的小说中收敛许多。事实上,在《来生再见》中,塑造小人物的情欲生活并非是为了消解英雄的需要,而是塑造英雄的需要。这如同将远去的先辈表达为当下的人的过程。虽然其中讲述的人物包括“我爹”黄抗日,但以平视的视角看待历史仍是1990年代后的时代精神所致,这种精神是一种经历了1980年代启蒙的、反造神的“人”的精神,所以它更有政治的反抗性。不过有一点需要承认,就是这些被塑造起来的英雄,并非如无目的的历史对应物,他们的参战和自我性格的觉醒,证明了他们仍是某种程度上自我的主人。这种状况在参军的中学生程眼镜、童大嘴、毛领子等人的身上都有体现,即便如黄抗日这样先后混迹于国军、伪军、游击队、镇供销社的乡土农民,甚至包括猥琐的田矮子,他们不确定的历史身份,都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他们既尴尬而又能委曲求全的独立自我。黄抗日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历史让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吊诡,吊诡并不为过,为过的只能是无法继续吊诡。何顿刻意以非英雄化的方式讲述历史,其实也正在于这种基于平民的历史观在起的作用。也许正应了毛泽东的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

何顿与先锋作家相近的一点,是如马原的叙事圈套般的小说写作方式。具体的说,就是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以现实中的“我”和虚构中的“我”同体出现,如戏剧演出中打破舞台限制的“第四堵墙”,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跟随“我”的叙述,在无法辨别作者的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畅想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的叙事环节。现实的“我”有一个带路的作用,容易让读者在一种近似自叙传的行文中感知到小说叙事者的温度。这样的写作方法比较方便拉近读者和作为叙事者的隐藏作者的关系。让本应退居幕后、不动声色而又力求全知视角的作家变成一种新的叙事行动元。

正如穿插历史和现实的小说都要有一个有关回忆的结果,《来生再见》也同样注意到了这种让记忆回归现实的需求。当然,因为“我爹”黄抗日等人

一直生活到了新时代,所以对他们晚年境况的了解,也成为引领政治意识形态变革的风向标。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革命改变了国家,而国家又通过革命改变了个人。黄抗日在1949年后的命运,其实就是这后一种变革的例证。他先是做了镇供销社的副主任,娶妻生子,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被造反派批斗,被迫装疯以躲过迫害,新时期随着儿女参加高考,获得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在与昔日战友相聚时,生活也有了改观。而同为战友的田国藩和毛领子却没有这些变化,他们平静而不富裕的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安然于这一时间段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和平。这也许是历史中的人在渡过历史之河后了无生息的结果。虽然他们有价值,但也仅限于曾经的历史瞬间。这正如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所称的“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事物都围绕这个基础转。”^[6]如果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待更为长远的中华文明史,抗战史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段落,但对于拥有这段历史的民族来说,在战争中所显现的民族伟力,也才更有可能成为深藏于这个民族肌体的精魂之中。大历史不属于个人,它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平常人感受不到,也只有小说才能给人以关注。何顿以黄抗日几十年的回忆来写作历史小说,也许正是在无意识中触摸到了某种来自中华民族,尤其是湖南人心中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基础,它不随短时间段的“事件性历史”而变,而是在他的三部抗战小说中,让他的不同主人公在历史的瞬间呈现出超越平实生活的精采人生。

青年时期的何顿仰慕战争中的英雄,这一情怀

在他步入中年后,以抗战小说的形式进行了自我验证。这大概也是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初期的写作对象是自己身陷囹圄的苦闷现实,支撑他写作的是奔波的青春,后期的写作对象是世界和历史,支撑他的是人生的智慧和历史的扑入感。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是单纯的重复性作家,何顿在《来生再见》后又发表了《黄埔四期》,这是一部以国民党高军阶军人为写作对象的小说。主角是谢乃常、贺百丁等人,时间跨度从黄埔四期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正面描写国民党高军阶军人的小说比较少见,这部小说的出现,尤其是其中有关原国民党军人在和平年代生活的描写,超过了以往的政治敌对情绪。相对以往的抗战题材小说,确属进步。当然,这两部虚构小说都有一些非虚构小说的创作特征,这也是何顿在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延续。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 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J]. 山花. 1995(1):57.
- [2]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修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7.
- [3] 陈晓明. 走向新状态:当代都市小说的演进[J]. 文艺争鸣. 1994(4):31.
- [4] 班固. 汉书·艺文志第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5.
- [5]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31.
- [6] 费尔南·布罗代尔.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M]//费尔南·布罗代尔. 论历史[M]. 刘北成,周立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6.

责任编辑:黄声波